

增量提质:营商环境生态与专精特新企业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夏清华 朱清

内容提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强,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本文以省级数据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区域层面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的复杂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单一的营商环境要素并非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或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2)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路径有2条,即“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且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路径同样存在2条,即“政务引领型”和“优势均衡型”。(3)不存在同时可以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的营商环境组态,但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促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营商环境组态,并为不同区域加快实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 专精特新 创新能力 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8-0126-19

一、问题提出

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处在产业链核心位置,能够克服中小企业的资源约束、低端锁定等“硬伤”^[1-2]。《“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指出,聚焦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构建从孵化培育、成长扶持到推动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梯次培育体系。培育一批高质量的专精特新企业,有助于补链、固链、强链,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6]。回顾专精特新的发展历程,从探索实践到重视肯定,再到全面铺开,可以说,专精特新企业兼具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不仅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企业自身战略定位、资源能力交互作用的时代产物,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然而,“卡

收稿日期:2023-01-28;修回日期:2023-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创新网络演化及风险治理研究”(20&ZD072)

作者简介:夏清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430061;

朱清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脖子”技术、细分市场“天花板”等因素使得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近年来,虽然专精特新作为重要的政策概念与实践现象逐渐被学者所关注,但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有关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处于初期的快速积累阶段,尚未形成全面、稳定、一贯的理论体系。在已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将专精特新企业视为“单项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后备力量,分析其“提质”问题,即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向上跃迁”^[7];还有部分学者将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探讨其“增量”问题,即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向下辐射”^[8]。相关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但仍然有所欠缺: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处于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其成长问题鲜被纳入非线性演化的复杂系统研究范式中^[9-10],已有文献也无法回答宏观层面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11];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忽略了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探讨往往围绕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塔尖”——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展开^[12],而“塔基”——中小企业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地。需要明确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多维性与丰富性,专精特新企业应系统地创造竞争优势^[13]。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然而,中国不同区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理论上,以营商环境为重要体现的制度框架对新兴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至关重要,深刻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与网络关系^[14]。营商环境被定义为“市场主体在准入、经营和退出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15-16]。具体而言,营商环境确定了区域内的合法性规则,建立了创新的激励机制,并为创新活动分配相应资源,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17-18]。实践中,专精特新企业与营商环境生态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与提质对营商环境生态有着差异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应具备灵活性以应对动态的、复杂的营商环境生态^[19]。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其战略选择、资源禀赋、绩效表现等方面均不同于大型企业,对自身发展所面临的营商环境变化可能会作出有别于大型企业的响应,既有研究结论可能无法适用于解释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将对较小规模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20]。因此,塑造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协同发展的营商环境是缓解区域间差异、实现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重要举措^[21-23]。但是,政府的注意力与资源都是有限的^[24],而且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25],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才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亟需探索的科学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以中国31个省份(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为样本,定性比较分析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探究营商环境组态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尝试回答如下问题:某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是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必要条件?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以及是否存在一种或多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和质量?以期挖掘营商环境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作用机制,揭示营商环境生态在中小企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并为不同区域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提供理论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 专精特新与隐形冠军

西蒙(2015)提出隐形冠军企业具有如下特点:(1)不为消费者所知;(2)在行业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规模不大,但生存时间往往在30年以上;(4)专注于利基市场^[26]。这些市场领导者对德国可持续性的出口能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的主力军。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解释了为何德国能够保持强劲的出口能力^[26]。同德国相似,中国有着深厚的制造基础和大量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量的90%以上)。虽然2021年中国绝对出口额达到了3.3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出口额远远落后于德国、韩国、法国等国家,并不能算全球化的真正赢家。在双循环背景与解决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导向下,中国开始着力培育更多中国式隐形冠军企业,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中小企业家们也逐渐意识到“隐形冠军”的现实意义,尝试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方向。

现有研究在探讨隐形冠军企业时,从战略、能力、认知等视角切入,在理论层面探讨了隐形冠军企业成长与绩效背后的复杂作用机制^[27-31],也关注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剖析制度环境对隐形冠军企业的影响。一个例外是,兰道等(Landau et al.,2016)指出,隐形冠军企业具备制度杠杆能力,能够利用制度环境提供的有形或无形支持获得战略利益,将区域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制度杠杆能力可以解释隐形冠军企业的内部异质性^[32]。实践中,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研发环境、双轨制教育体系、国际化的氛围等制度性因素为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由于全国各地的转型速度不均衡,制度环境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与不稳定性^[33]。制度环境将深刻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成本、风险、机会。例如,朱等人(Zhu et al.,2012)确定了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创新的五大关键制度障碍:公平竞争、融资渠道、法律法规、税收负担和支持系统^[34]。综上,专精特新企业的提质需要创新、开放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与基础。

(二) 专精特新与中小企业

广大中小企业是中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逆势增长,嵌入高端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5-36]。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规模不经济、特色难彰显、组织化程度低等瓶颈,尤其众多制造业中小企业被锁定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37],附加值较低,现阶段并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38]。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群体内存在极高的异质性。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在乌卡(VUCA)时代,此类企业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体现在:(1)经营状况(产销、订货、盈利等)明显好于中小企业总体;(2)企业创新活跃;(3)对未来信心较强。中小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培育一批高质量的专精特新企业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对于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较少在宏观层面、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讨中小企业的培育机制^[39],尤其缺乏对中小企业成长的过程性分析。已有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方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19,40]。卡洛菲等(Caloffi et al.,2022)的研究也表明,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创新补贴、技术和创新咨询服务等创新政策工具组合^[41]。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系统的规范性与健康性深刻影响系统内各主体的价值共创行为,中小企业的生存(stand-up)、创业(start-up)与增长(scale-up)尤其取决于与地方政策、法规和文化相关的制度性环境因素^[42-44]。综上,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创新驱动成长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40]。

基于上述分析,现有文献对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路径、机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现有

文献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策分析方面,鲜有文献从生态系统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不同区域内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影响^[40]。实践中,制度环境差异是理解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线索^[45]。中小企业与隐形冠军企业的成长均离不开所处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并且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的互动往往是非线性的、复杂的^[11,32]。此外,专精特新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构念,不应仅仅被视为隐形冠军的“预备役”或广大中小企业的“终极理想”,而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模式与理论体系。特别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创新链、产业链的中坚力量,处于梯度培育体系的中间层,具备跃升潜力与辐射能力^[22,46],但针对该类企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理论框架

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生态反映了区域内影响市场主体活动的综合环境,既是区域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18,21,47]。已有学者探讨了省域、市域、县域层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创业活跃度^[11]、全要素生产率^[21]、民营企业经营活力^[48]、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49],以及营商环境自身存在的空间竞争效应^[49],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启示。但仅有少量研究分析营商环境与中小企业成长的关系,如邵传林(2021)认为营商环境改善能够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影响区域内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20];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发现良好城市营商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有助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22]。综上所述,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采用营商环境生态框架,以营商环境要素作为组态条件,尝试识别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多重实现路径。

中国不同省份间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差异^[23,45],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与发展在省域间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关注省域层面营商环境对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影响,以期对各省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不同省份间的平衡发展提供启示。在营商环境生态的分析框架方面,现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评价体系,例如李兰等(2019)采用政府效率、司法效率、产权保护环境、投融资环境、要素市场环境、中介服务环境与政府干预共计7个因素测量营商环境指数^[5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构建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涉及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6个指标^[47]。张三保等(2020)基于“十三五”规划中对营商环境的阐述,确定了围绕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共计4个维度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18]。该评价体系更加符合中国情境、突出中国特色,能够从多维度衡量省域营商环境,与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问题相呼应。鉴于此,本文将关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王一鸣(2020)指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特征之一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有必要在未来发展中填补数量缺口与质量缺口^[51]。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通过营商环境保障创新驱动和科技突破,实现技术迭代与赶超;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增长的核心在于,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平衡作用机制,塑造适宜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化发展的营商环境。西蒙(2015)指出隐形冠军的竞争优势源于创新,并且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创新竞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尽管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隐形冠军企业仍保持对研发的持续高投入^[26]。李和马莱尔巴(Lee & Malerba, 2017)认为实现产业引领与追赶取决于技术窗口、需求窗口和制度窗口,其中制度本身既是窗口,又会影响技术窗口与需求窗口的形成与消失^[52]。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是创新,通过营商环境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应在创新^[4]。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拥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及组织可利用性的资源^[53];制度理论指出,企业需要遵守制度环境的规则和规范以获得合法性^[54]。创新可以使企业区别于同行,同时也可能阻碍其合法性的获

得^[55]。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有必要考虑一致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创新三角形框架包括成本-风险-机会(CRO),其中创新成本是指税收负担、融资渠道和进入壁垒;创新机会包括与竞争公平、行业垄断和获得公众支持等相关的因素;创新风险是指应对复杂法规的能力、外部服务的可用性、市场力量的程度,以及新技术、新市场的渠道与信息^[34]。上述三个维度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制度性助力或阻力。综上,本文将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创新三角形框架,探索营商环境生态对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影响,以下介绍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与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关系。

(一) 市场环境 with 专精特新

1. 市场环境 with 专精特新数量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的重要基础,涉及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市场中介^[18]。中小企业往往存在资源不足、路径依赖、抗风险能力差等结构性问题。专精特新化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融资环境、研发投入、中介支持,以及更低水平的资源获取成本。尤其是,实现成为利基市场的领导者的宏伟目标,有赖于市场的公平环境^[30]。区域范围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增加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而竞争失调的市场环境将严重打击中小企业家的积极性,减少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2. 市场环境 with 专精特新质量

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制度环境给予市场主体充分的创新空间。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意味着市场受到的政府干预更少,参与的非国有商业活动更多,拥有更加开放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56]。大量研究表明,市场环境深刻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19]。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各类要素的综合作用能够为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提供创新机会并减少创新风险^[34],提升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为其技术跃迁、创新引领打下基础;而竞争失调的市场环境将使得专精特新企业被“挤出”创新竞赛。

(二) 政务环境 with 专精特新

1. 政务环境 with 专精特新数量

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涉及政府关怀、政府效率、政府廉洁与政府透明^[18]。为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培育提供良好的政务环境,从而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梯度成长,考验着各地政府的管理智慧。良好的政务环境为中小企业通过制度杠杆能力打破自身的资源劣势,获得进一步成长奠定了基础^[32]。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以及高水平的关怀,能够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并提振中小企业家信心,促使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道路。

2. 政务环境 with 专精特新质量

实践表明,良好的政务环境将带来创新活动的增加。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以及高水平的关怀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开发创新机会并减少创新风险,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行为。政府向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的制度支持,包括创新基金、创新券等各类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并增强创新产出^[7,41,57],使其获得并维持在利基市场上的先行者优势^[58],进而提升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三) 法律政策环境 with 专精特新

1. 法律政策环境 with 专精特新数量

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涉及司法公正、产权保护、社会治安、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18],是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的重要保障。其中,司法公正、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等监管措施能够改善契约环境,对于创业、创新、

提高生产力以及促进增长均十分重要^[59];产权保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的重要举措,能够降低市场摩擦,有利于拓宽外部融资渠道,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60]。因此,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有助于区域内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化。

2. 法律政策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法律政策实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表现在政策责任存在于多个组织之间的多级分散机构,即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监管来自不同的部门或不同地区政府,且这些政策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营商环境生态内的司法公正、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以及产权保护、社会治安,能够促进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并简化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进而提供创新机会并降低创新成本,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技术跃迁、创新引领^[61]。

(四) 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

1. 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数量

人文环境以开放包容为目标,涉及对外开放与社会信用,是营商环境生态中无形的文化土壤^[18]。对外开放将有助于新技术、新资本与新市场的形成,正向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性^[62];区域范围内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打破银企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间信任,进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促进组织间的学习^[63]。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进而实现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增长;而封闭固化的人文环境将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的“低端锁定”,不利于其转型升级。

2. 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区域对外开放与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获得融资渠道、公众支持及外部服务,并且能够为该区域注入新技术、新渠道与新信息。利基战略要求专精特新企业“走出去”,采用全球利基商业模式是专精特新企业克服细分市场局限和增加海外销售的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64]。已有研究表明,当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时候,中小企业家将愿意承担更多风险,更有动力进行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56]。因此,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能够为专精特新企业减少创新成本、提供创新机会并降低创新风险,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进一步成长为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

(五) 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要素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已有研究为营商环境要素与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厘清营商环境生态对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多元路径和复杂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首先,单一营商环境生态要素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之间的关系存在情境性。例如,周江华等(2022)认为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双刃剑”影响,取决于企业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62];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且资源配置手段发挥着差异性的调节作用^[65]。其次,在复杂的营商环境生态下,不同要素之间往往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相互影响^[23]。低融资可得性、政府过度干预等营商环境因素将对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毁灭性打击,造成区域内的创新负循环。理论上,市场环境中更高的融资水平、中介支持与更低的资源获取成本,有利于创新的投入、转化与产出,与此同时,人文环境中的社会信用将促进产学研合作与产业集群,将进一步地优化市场环境内的资源配置,形成区域内的创新“正循环”。但实证研究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时,社会信任水平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将不再显著,即市场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56]。再次,不同细分行业由于产业类型、生命周期的差异,需要营商环境要素的差异性配置。专精特新企业布局在“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主要分布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行业,基本为技术密集型产

业,但仍然可以依据产业成长阶段分为成长期产业和成熟期产业;依据产业组织结构类型分为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对营商环境生态有着差异性的需求^[66]。基于上述分析,营商环境生态内各要素的复杂互动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质量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性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组态视角开展研究,重点探索营商环境生态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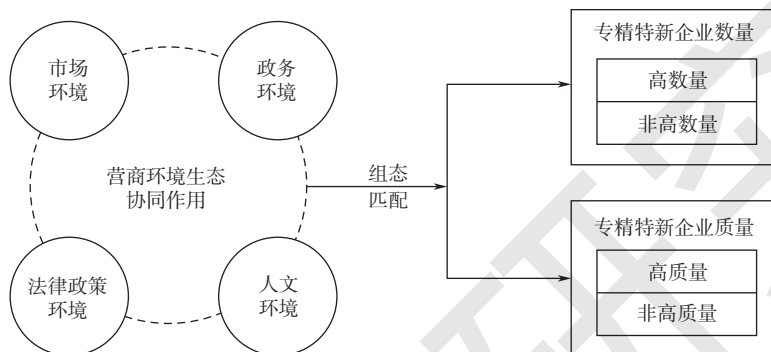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定性及定量研究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已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67]。定性比较分析吸收了定性分析的优势(案例导向和深入性),同时避免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大样本导向和低细粒度)。传统的回归分析旨在探索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68-69],而基于集合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能够检查复杂的因果关系,判断不同的前因条件如何“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研究了营商环境中包含的四个重要的因素(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如何协同作用影响省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

(二) 数据构建

1. 数据来源

自2019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8997家。这些“小巨人”企业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也是中国未来的隐形冠军企业。具体而言,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市场细分占有率在全国或所在省份名列前茅,研发实力强且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科技成果,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2》以及智慧芽《2022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报告》。相关报告的基础数据源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渠道,为本文尝试探索的问题——“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才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 测量与校准

该组态分析的前因条件为营商环境的四个维度——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相应数据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2》的一级指标。本文针对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与专精特新企业的客观情况,尝试探索区域层面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的衡量方式。其中,“量的合理增长”以区域累计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衡量;“质的有效提升”要求创新驱动与科技突破,实现技术迭代与赶超,参考以往学者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测度^[70-71],本文采用平均每家“小巨人”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来衡量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量水平,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由于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无法使用专利总量进行衡量,因此采用平均专利数量衡量其创新水平;(2)发明专利相较于于

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及创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产品技术的新突破^[72]; (3)转型经济情境下,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具体表现为放弃续费已成功申请的专利^[73]。省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数据来自智慧芽《202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报告》。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参考以往学者对制度性要素的处理方法^[74],营商环境作为前因条件以各省份 2017—2020 年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均值进行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2》。

参考已有研究^[21],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四个前因条件和两个结果的三个锚点,即完全隶属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和交叉点阈值,设置为案例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并采用[85%,50%,15%]的校准锚点作为稳健性检验。另外,为了避免在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 0.50 的组态归属问题,本文将 0.50 隶属度减去 0.001。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校准及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449.50	224.00	62.00	299.29	281.50	4	1 079
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16.33	12.19	8.87	13.61	5.59	5.53	24.67
市场环境	34.88	30.37	26.23	33.18	11.15	16.27	66.00
政务环境	61.56	53.44	49.81	55.15	9.82	28.35	72.39
法律政策环境	52.76	41.28	34.11	43.05	11.34	22.22	69.80
人文环境	76.56	67.39	54.48	62.69	18.97	1.63	85.83

五、实证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参考已有文献,首先对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必要性条件指结果发生时始终存在的条件,依据一致性水平判定。当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时,则称为对应结果的必要条件^[21,69]。表 2 为通过软件 fsQCA 3.0 得出高水平/非高水平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必要性分析的结果。由表 2 可知,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这表明单个营商环境条件不是产生区域专精特新企业高水平及非高水平数量/质量的必要条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市场环境	0.849	0.884	0.235	0.246	0.712	0.788	0.344	0.337
非高市场环境	0.275	0.264	0.889	0.856	0.401	0.409	0.784	0.706
高政务环境	0.792	0.760	0.360	0.347	0.716	0.731	0.374	0.338
非高政务环境	0.320	0.332	0.752	0.784	0.351	0.388	0.702	0.686
高法律政策环境	0.655	0.665	0.424	0.432	0.630	0.680	0.430	0.411
非高法律政策环境	0.441	0.433	0.671	0.661	0.454	0.474	0.665	0.614

表2(续)

前因条件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人文环境	0.705	0.712	0.384	0.390	0.639	0.686	0.440	0.418
非高人文环境	0.396	0.390	0.716	0.709	0.458	0.480	0.669	0.621

(二) 组态分析

由于省域层面案例的重要性,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时,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并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0^[75-76]。此外,现有文献并无定论支持特定营商环境条件影响结果的方向,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本文采取比较谨慎的选择,假设单个营商环境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能影响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软件fsQCA 3.0的组态分析将输出复杂解、简约解与中间解。同已有研究^[75]保持一致,组态分析主要汇报中间解,辅以简约解。其中,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的判定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77]所提出的标准。最后,本文遵循组态理论化的流程,对发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命名,以深化组态理论^[76]。表3显示存在2个实现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S1a、S1b),存在2个导致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S2a、S2b);表4显示存在2个实现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S3、S4),存在1个导致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S5)。

表3 实现高/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组态 S1a	组态 S1b	组态 S2a	组态 S2b
市场环境	●	●	⊗	⊗
政务环境	●	●	⊗	⊗
法律政策环境	●			●
人文环境		●	⊗	
一致性	0.940	0.986	0.890	0.925
原始覆盖度	0.602	0.595	0.529	0.283
唯一覆盖度	0.129	0.122	0.345	0.099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40		0.88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24		0.629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表4同。

表4 实现高/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组态 S3	组态 S4	组态 S5
市场环境	⊗	●	⊗
政务环境	●	●	⊗
法律政策环境	⊗	●	⊗
人文环境	⊗	●	⊗

表4(续)

前因条件	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组态 S3	组态 S4	组态 S5
一致性	0.862	0.886	0.824
原始覆盖度	0.171	0.395	0.443
—覆盖度	0.123	0.347	0.44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85		0.82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518		0.443

1. 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发现2个营商环境组态(S1a、S1b)能够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S1a与S1b由于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18)。基于简洁地表达、捕捉整体和唤起组态的本质的原则,以及兼顾整体性和独特性的要求^[21,76],本文将S1a和S1b分别命名为“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

(1)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组态S1a指出以高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高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该组态表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中小企业梯度成长的基础保障,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能够对中小企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69]。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上海市和浙江省。以浙江省为例,坚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针对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提出4个方面、19个领域的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浙江省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推动,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公共品牌——“浙江制造”。“浙江制造”品牌的打造,强化了省内的“标准+认证”,改善了组织学习方式与企业绩效,既使高品质、高水平的追求深入广大中小企业家、消费者的内心,也引领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奋力成为行业的标杆和领导者。目前,浙江省共计获批107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位居全国第一。

(2)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组态S1b指出以高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高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该组态表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并辅以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以广东省为例,力求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广东省致力于打造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高地和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勇当制造业“尖子生”,具备世界一流的先进工厂、全国领先的工业设计能力以及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广东省的制造业已走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廉价竞争的“怪圈”,通过制造专业化、结构高端化、增长“精明化”深深嵌入“武藏曲线”的中间环节^[78]。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广东省具备了更高起点、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水平^[23]。同时,广东省政府不断探索通过政务诚信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道路,已初步建成社会信用体系基础框架,完善了区域人文环境。目前,广东省累计获批88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位居全国第二。

此外,营商环境生态中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共同导致了组态S1a、S1b之间的重叠,基于重叠的前因条件,

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反映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下,法律政策环境或人文环境作为辅助条件均可促进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这说明,在市场与政府共生关系建立的基础上^[11],营商环境中的“硬环境”——法律政策或“软环境”——人文,具备其中一种便可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增长。两者(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无须同时存在,即便同时存在也并未成为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方面的新助力。可能的原因是,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集群化程度较高、产业生态趋于完备,广大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增长,已经取得了规模的扩张。

2. 产生区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出于检验因果非对称性的考虑,本文分析了产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发现2个组态产生区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且2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组态 S2a 显示,在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缺乏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为非高。组态 S2b 显示,在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且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存在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同样为非高。相应组态表明,在丧失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机制后,即使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也不利于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具体而言,当地市场竞争失调且当地政府执政能力欠佳,既无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也无法运用“轻推之手”“帮助之手”“重手”优化与中小企业成长相关的资源配置^[21]。在竞争失调、制度缺乏的背景下,即便政府确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也无法克服其结构性缺陷,将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中小企业的“衰亡”将成为常态,专精特新化发展将成为奢望。

3. 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发现2个营商环境组态(S3、S4)能够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并将S3和S4分别命名为“政务引领型”与“优势均衡型”。

(1)政务引领型。组态 S3 指出以高政务环境、非高法律政策环境、非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非高市场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该组态表明,即使在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的前提下,高效、廉洁、透明的有为政府以及高水平的关怀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开发创新机会并减小创新风险,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贵州省。具体而言,虽然贵州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数据与信息壁垒等限制市场主体持续创新的客观问题,但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例如,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加大贵州小企业创业基地和贵州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支持贵州股权交易中心设立“专精特新专板”,为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专门化、专业化、专项化的资本市场服务。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利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竞赛中取得先行者优势尤为关键。上述相应举措既有保障功能,能够打消企业追求精益求精的后顾之忧,也有监督功能,因为高效的政府监管可以矫正低质量创新行为^[7]。因此,以上举措有助于专精特新“小巨人”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为其跃升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目前,贵州省总体营商环境指数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位列第24,但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5.42件,排名第11。

(2)优势均衡型。组态 S4 指出以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法律政策环境和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该组态表明全方位建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与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即打造具备优势且均衡发展的营商环境将实现专精特新企业“质的有效提升”。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广

东省。以北京市为例,从“简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监管”四个方面入手,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生态^[18]。另外,北京市大力推进集约集聚发展模式,支持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并鼓励各区给予房租减免、运行补助等支持。政府积极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全面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通过营商环境生态建设为其提供优渥的创新环境。因此,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将注意力与战略资源集中于满足客户需求,并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扩充“杀手锏”技术,深挖服务导向与技术导向的“护城河”^[79]。相关举措将切实降低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本、为其提供创新机会并减小创新风险,有助于形成利于利基企业成长且高活跃度、高质量的区域性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北京市总体营商环境指数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位列第2,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数为24.08件,排名第2。

4. 产生区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探索了产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发现存在1个组态可以产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组态S5显示,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缺失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为非高。这说明区域内各营商环境维度都表现不佳时,难以实现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的有效提升”。具体而言,专精特新具有极强的“政府印记”,即使当地的营商环境生态亟待优化,每个区域均会选拔一批“小巨人”企业。相应企业或许在“专”“精”“特”“新”各个方面均表现良好,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但却很难“更上一层楼”。背后可能的机制是,制度劣势终将转化为企业劣势。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成长所需的外部资源,并产生独特的、基于地理位置的制度优势。隐形冠军企业十分依赖通过制度杠杆能力获得成功^[32],健全的制度环境将赋予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制度优势。反之,掣肘于制度劣势,在营商环境各方面建设均不足时,专精特新企业的“提质”将难上加难。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研究^[11,74],本文首先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PRI一致性阈值提升为0.75,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仅一致性与覆盖度发生了微小改变。其次,通过调整校准锚点检验组态的稳健性。将完全隶属调整为第85百分位数,完全不隶属锚点调整为第15百分位数,交叉点不变,得到的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致。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四) 进一步分析

1. 区域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分析

受以往学者^[23]研究的启发,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区域间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本文首先绘制了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水平分布图。如图2所示,实线表示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虚线表示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判定标准同前文提及的校准锚点一致,即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为了探索省域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协同性与整体性,本文结合相关理论与研究结果归纳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高质量发展)—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非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并寻找典型案例。

结合组态S1a、S1b、S3、S4可以得知,并不存在可以同时实现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的营商环境组态,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可以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结合组态S2a、S2b、S5可以得知,存在一个营商环境组态将同时导致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S5),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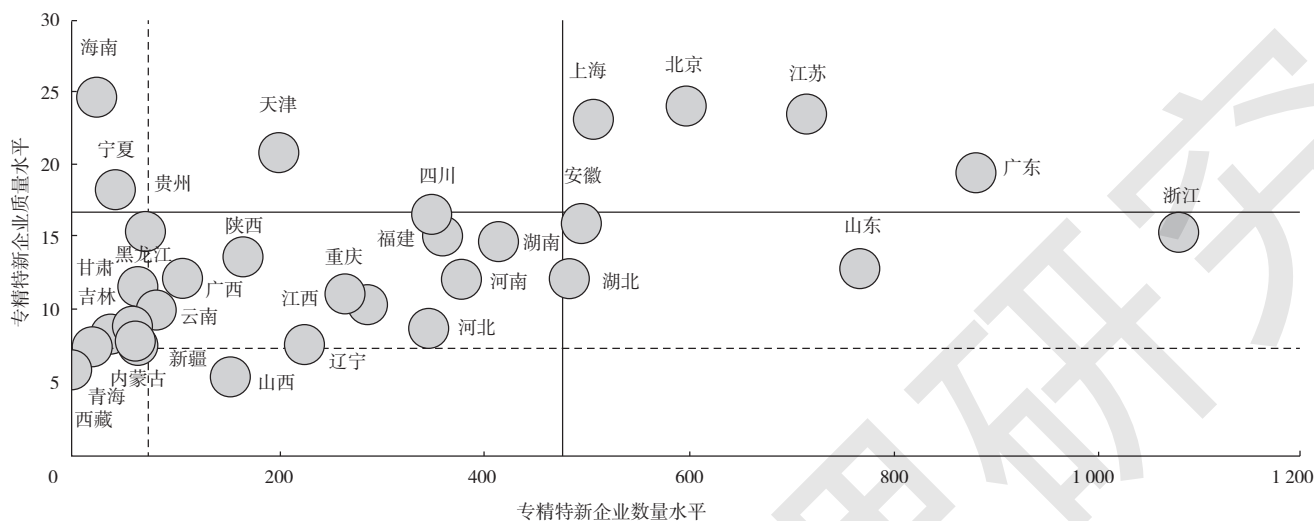


图2 31个省份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水平分布

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缺失。聚焦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虽然营商环境优化难以取得“鱼和熊掌兼得”的效果——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数量与高质量,但各要素均表现不佳的营商环境将导致“鱼和熊掌兼失”——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非高数量与非高质量,陷入“低质量锁定”。有研究表明,仅仅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难以实现区域层面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还需要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奏响追求卓越、专注于国际化的创新创业主旋律^[22],以强化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2. 区域间对比分析

图2显示,具有双低特征的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水平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新疆、青海、西藏等),具有双高特征的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水平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在极值方面,海南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量小质优”的特点,浙江省表现为“量大质良”,均表现出了“质”与“量”的不均衡;大部分省份质与量的发展较为均衡,但与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距离。

首先,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实力高度相关。东部地区近几十年来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政府不断创新治理职能,助力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突破技术锁定。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创新创业活力较低,制度环境处于低稳定性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很难克服自身存在的资源劣势,生存率较低。因此,东部地区,尤其是呈现双高特征的省份,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西部地区,尤其是呈现双低特征的省份,应结合自身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差异性地进行增量提质路径,针对性、配套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其次,部分省份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出现了“质”与“量”的不均衡。海南省虽然共计获批21家“小巨人”企业,但企业平均有效专利数量达到24.67件,位居全国第一。海南省自2018年重点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即“3+1”产业),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同时,更关注细分产业的龙头企业,给予利好的产业政策,并引导龙头企业作为“链主”发挥领军和生态整合作用。但实际结果是,领军作用凸显,生态整合作用仍有待加强。浙江省虽然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但企业平均有效专利数量排名并未进入第一梯队。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专精特新企业密度的提升,区域内竞争性的作用大于合法性,一方面竞争性将威胁到中小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竞争将会抑制创新。因此,浙江省应在保持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着力打造有利于利基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最后,大量省份专精特新企业质与量的发展较为均衡,但与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距离。以湖北省为例,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方面,整体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呈现重点地区发力冲刺、中小民营主导支撑的特征。在前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中,中型企业占比超过50%;2022年公布的第四批“小巨人”中,小型企业占比约为56.1%^①。但从全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看,湖北省在“质”与“量”方面与双高省份存在一定差距。目前,湖北省的产学研机制有待进一步融合深化,虽然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尚未形成高效的创新攻坚合力,尤其是大中小企业梯度培养模式有待探索。产业链不够齐全,新业态、原创性新兴产业生成能力不够强,虽然着力建设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已经具备研发、转化、生产各环节所需的产业体系,但各城市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分工合作,影响了创新效率的提升。“武鄂黄黄咸”一体化发展有待深入推进,政策普惠、要素流动、资源共享等协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六、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 结论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各区域政府注意力与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差异性统筹协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复杂系统视角,以省级数据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了营商环境生态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多元路径。

首先,单一的营商环境要素并非区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或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这说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重手”“轻推之手”或“帮助之手”助力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化。其次,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路径有2条,即“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且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路径同样存在2条,即“政务引领型”和“优势均衡型”。各地政府应结合当地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情况,确定增量与提质的优先级,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辐射作用和跃升潜力。再次,不存在可以同时产生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的营商环境组态,但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非高专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在推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营商环境优化难以取得“鱼和熊掌兼得”的效果,但是各维度均缺乏的营商环境将导致“鱼和熊掌兼失”。

(二) 研究贡献

在考虑区域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复杂性差异的基础上,厘清了营商环境组态对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和质量

^① 数据来源于2022《湖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报告》。

的不同影响路径,为各区域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中小企业纳入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体系。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环境和历史条件,各类企业的成长速度及规模必然会有差别,但不同企业的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12-13]。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中小企业应当“有所作为”,通过走专精特新之路,发挥差异性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4]。本文厘清了营商环境生态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与提质,为不同区域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或增加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探索了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制度逻辑,并基于复杂系统观分析中小企业的成长问题。制度逻辑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起着关键性作用^[14,34,80],本文识别了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产生差异的营商环境要素,深化了对区域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理解。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处于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中,是利基企业的代表,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与枢纽企业、基石企业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生非线性演化^[39]。本文的研究响应了学界对于复杂系统研究的呼吁^[10,21],尝试在宏观层面剖析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

(三) 实践启示

本文基于省域营商环境生态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单一营商环境要素不足以促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由于营商环境生态的现状差异,不同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也具有差异性。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促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营商环境组态,并为不同区域加快实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主要有以下两点管理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与量的协同发展。目前,大部分省份的专精特新企业在数量与质量上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而这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壁垒,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此外,中小企业具有集群化成长的特征,在梯度培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马太效应”。目前,各地政府已高度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提供房租减免、运行补助等支持,部分省份还对迁入当地的“小巨人”企业提供一次性奖励,支持其吸引上下游企业同区域落地。然而,相应政策只能带来增量,在提质方面的作用较小。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与质量需要协调发展,各区域可以通过把握差异化的营商环境组合,有侧重地实现增量或提质。

第二,完善梯度培育体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也有助于为其他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应该从专精特新中得到启示,但具体到某个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之路应具有特殊性。政策制定者应当明确,不存在围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良方秘药”与“一刀切模式”。培育工作突出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复制。各地政府可以策略性地选择工作重点,结合当地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产业基础等实际条件,实施有效的梯度培育政策,最大限度地打造具备制度优势的营商环境生态,助推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

(四) 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聚焦省域层面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将其拓展到市域甚至县域层面,以获得更具细粒度的理论贡献

与实践启示。其次,由于政策的实施窗口,本文基于前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静态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并且无法获得动态性的结论,未来可以开展时序性的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大样本的面板数据分析。再次,在衡量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方面,本文仅分析了其创新产出,未来还可以纳入研发投入、创新效率、国际化、专注度等指标来评价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量。最后,本文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并未探讨非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营商环境生态的差异化需求,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非专精特新企业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葛宝山,赵丽仪. 隐形冠军精一创业能力生成机理及路径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2,40(10):1821-1833.
- [2] 朱秀梅,董钊. 精益创业对创业拼凑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1,39(2):295-302.
- [3] 陈劲,尹西明.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J]. 科技中国,2022(10):11-14.
- [4] 董志勇,李成明.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与路径选择[J]. 改革,2021(10):1-11.
- [5] 柳卸林,高雨辰,丁雪辰. 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J]. 管理世界,2017(12):8-19.
- [6] 李平,孙黎. 集聚焦跨界于一身的中流砥柱:中国“精一赢家”重塑中国产业竞争力[J]. 清华管理评论,2021(12):76-83.
- [7] 曹虹剑,张帅,欧阳峒,等. 创新政策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J]. 中国工业经济,2022(11):135-154.
- [8] 丁永健,吴小萌. “小巨人”企业培育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吗——来自“专精特新”政策的证据[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12):108-116.
- [9] 杨晓光,高自友,盛昭瀚,等. 复杂系统管理是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J]. 管理世界,2022,38(10):1-24.
- [10] 张玉利,徐海林. 中小企业成长中的复杂性管理及知识显性问题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18-23.
- [11]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20,36(9):141-155.
- [12]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 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9-41.
- [13] 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14] MINH T T, HJORTSØ C N. How institutions influence SME innovation and networking practices: the case of Vietnamese agribusines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5, 53(S1): 209-228.
- [15] 李志军.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 [16] 李志军. 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1.
- [17] LU Y, TSANG E W K, PENG M W.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toward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25(3): 361-374.
- [18] 张三保,康璧成,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2020,42(4):5-19.
- [19] ZHANG F, ZHANG H N, BROWN D H, et al.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aspirant markets: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pproach[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3, 40(2): 435-482.
- [20] 邵传林. 地区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9):42-61.
- [21] 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2022,38(9):127-145.
- [22] 叶振宇,庄宗武. 产业链龙头企业与本地制造业企业成长:动力还是阻力[J]. 中国工业经济,2022(7):141-158.
- [23] 彭伟,沈仪扬,袁文文.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营商环境对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3):10-23.
- [24] 谭海波,范梓腾,杜运周. 技术管理能力、注意力分配与地方政府网站建设——一项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2019,35(9):81-94.
- [25] 申烁,李雪松,党琳. 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6):124-144.

- [26] 西蒙·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M]. 张帆,吴君,刘惠宇,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 [27] AUDRETSCH D B, LEHMANN E E, SCHENKENHOFER J.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of hidden champions: lessons from Germany[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8, 26(1): 2-24.
- [28] VOUDOURIS I, LIOUKAS S, MAKRIDAKIS S, et al. Greek hidden champions: lessons from small, little-known firms in Greece[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18(6): 663-674.
- [29] TOFTEN K, HAMMERVOLL T. Niche firms and marketing strategy: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niche firm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9, 43(11/12): 1378-1391.
- [30] JOHANN M S, BLOCK J H, BENZ L.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s: evidence from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9(3): 873-892.
- [31] LEI L N, FU Y N, WU X B, et al. The match between structural attributes and content-based orientation of managerial cognition: an exploratory fsQCA study of 'hidden champion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22, 18(2): 395-423.
- [32] LANDAU C, KARNA A, RICHTER A, et al. Institutional leverage capability: creating and us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6, 6(1): 50-68.
- [33] DU Y Z, KIM P H, FOURNÉ S P L, et al. In times of plenty: slack resources, R&D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challeng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45: 360-376.
- [34] ZHU Y M, WITTMANN X, PENG M W. Institution-based barriers to innovation in SMEs in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4): 1131-1142.
- [35] LI P P, PRASHANTHAM S, ZHOU A J, et al. Compositional springboarding and EMNE evolu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2, 53(4): 754-766.
- [36] SAWERS J L, PRETORIUS M W, OERLEMANS L A G. Safeguarding SMEs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technology innovative SME-large company partnerships in South Africa[J]. *Technovation*, 2008, 28(4): 171-182.
- [37] RADZIOW A, BOGERS M. Open innovation in SMEs: exploring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n ecosystem[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6: 573-587.
- [38] 张培丽.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出路探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5): 25-31.
- [39] 夏清华,陈超. 商业生态系统“5C模型”与未来研究拓展[J]. *经济管理*, 2015, 37(10): 22-30.
- [40] BRUTON G D, AHLSTROM D, CHEN J Y. China has emerged as an aspirant econom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 38(1): 1-15.
- [41] CALOFFI A, FREO M, GHINOI S, et al.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a deliberate policy mix: the cas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dvisory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vouchers[J]. *Research Policy*, 2022, 51(6): 104535.
- [42] AUTIO E, KENNEY M, MUSTAR P, et al.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7): 1097-1108.
- [43] 宋华,陈思洁,于亢亢. 商业生态系统助力中小企业资金柔性提升:生态规范机制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3): 11-22, 34.
- [44] ZAHRA S A, WRIGHT M. Entrepreneurship's next ac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4): 67-83.
- [45]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4): 9-20.
- [46] 徐宁,姜楠楠,张晋. 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二元创新战略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19, 40(7): 163-172.
- [47]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 *管理世界*, 2021, 37(5): 98-112, 8.
- [48] 于文超,梁平汉. 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1): 136-154.
- [49] 阮舟一龙,许志端. 县域营商环境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贵州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20, 42(7): 75-92.
- [50] 李兰,仲为国,彭泗清,等. 当代企业家精神:特征、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2019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5): 4-12, 27.
- [51]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管理世界*, 2020, 36(12): 1-13.
- [52] LEE K, MALERBA F.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2): 338-351.

- [53]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54] POWELL W W, DIMAGGIO P J.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55] ZHAO E Y, FISHER G, LOUNSBURY M, et al.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broaden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1): 93-113.
- [56] WANG H Q, ZHAO T Y, COOPER S Y, et al. Effective policy mixes i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in Chin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3, 60(4): 1509-1542.
- [57] SHENG S B, ZHOU K Z, LI J J. The effects of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on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1, 75(1): 1-15.
- [58] KAMP B, RUIZ DE APODACA I. Leveraging (in) formal early-mover and diligent-follower advantage mechanisms to attain international niche market leadership: insights from Basque “hidden champions”[J/OL]. *Competitiveness Review*, 2023[2023-05-11]. <https://doi.org/10.1108/CR-10-2022-0158>.
- [59] YANG J S.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SM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3): 525-541.
- [60] HE W L, TONG T W, XU M T. How property rights matter to firm resourc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perty law enactment[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2, 33(1): 293-310.
- [61] 张树明, 张新. 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103-110.
- [62] 周江华, 顾柠, 张可欣.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企业成长性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23-132.
- [63] 马鸿佳, 马楠, 郭海. 关系质量、关系学习与二元创新[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6): 917-930.
- [64] HENNART J F, MAJOCCHI A, FORLANI E. The myth of the stay-at-home family firm: how family-managed SMEs can overcome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limit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5): 758-782.
- [65] 夏清华, 黄剑. 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与企业创新投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J]. *经济管理*, 2019, 41(8): 5-20.
- [66] 于明远, 范爱军. 结构软化、行业差异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6): 38-51.
- [67] 杜运周, 李佳馨, 刘秋辰, 等. 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 QCA 方法: 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 *管理世界*, 2021, 37(3): 180-197.
- [68] FURNARI S, CRILLY D, MISANGYI V F,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1, 46(4): 778-799.
- [69] RAGIN C C, FISS P C. *Intersectional inequality: race, class, test scores, and pover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70] 刘清春, 刘淑芳, 马永欢. 创新水平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工具变量回归模型[J]. *软科学*, 2016, 30(9): 11-14.
- [71] 张浩然. 地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OL]. *软科学*, 2022[2022-12-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21108.1700.010.html>.
- [72] 张峰, 刘曦苑, 武立东, 等. 产品创新还是服务转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创新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7): 101-118.
- [73] 江诗松, 何文龙, 路江涌. 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战略: 转型经济情境中的企业象征性创新[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2): 104-113.
- [74] GRECKHAMER T. CEO compensation in relation to worker compensation across countries: the configurational impact of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4): 793-815.
- [75]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J]. *管理学报*, 2019, 16(9): 1312-1323.
- [76]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 [77]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 [78] 张梦霞, 白建磊. 苹果公司的“元宝曲线”价值创造模式及启示[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10): 121-128.
- [79] 李平, 王扬眉. 特在深挖“护城河” 赢在双重保险机制[J]. *企业家*, 2023(1): 40-42.
- [80] WU Y W, EESLEY C E, YANG D L.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duri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2, 16(1): 185-206.

Growth of Quantity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pecialized, Refined, Unique and Innovative Firms

—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

XIA Qinghua, ZHU Q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1)

Abstract: Incubating specialized, refined, unique and innovative (SRUI) firms can help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chain, build great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s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reasonable growth of quantit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across China. Shaping a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How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is a pressing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problem.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akes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as samples. It qualitativel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xploring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iguration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how four important anteceden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ory, namely market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synergistically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ovincial SRUI firm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cubation of SRUI firms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it summarizes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generat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not high SRUI firms, and searches for typical cas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a single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quantity or quality of regional SRUI firms, but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 plays a universal role as the core condition. Second, two paths, market-government-driven with the support of laws and policies and market-government-driven with the support of humanities, can lead to the high quantity and 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leg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re substitutable, and there are also two paths leading to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SRUI firms, namely the government-led type and the advantageous and balanced type. Third, there is no single configuration that can simultaneously generate the high quantity and 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but there is one configuration that can produce non-high quantity and non-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nto the researc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SRUI firms, and analyzes the growth of SMEs based on a complex system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regional SMEs, this paper clarifies different impact path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thus assisting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may inspire local governments to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RUI firms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improve the gradient cultivation system, and foster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y-based SME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uniqueness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stitutional logic

责任编辑:李 叶